

# 詩人與盲美

□吳 正

因為構思的需要，我總喜歡偷偷地溜出辦公室，在戶外的那片平台花園上，背着手兒踱步。那是一片位於香港太古城住宅區的花園式平台：連接在高巖與高巖之間，寬闊、整潔、遍植花木；間隔着噴泉、水池、條椅、立地圍燈以及抽象雕塑的布局，給人以一種強烈的現代建築美學的感受。

可惜的只是：能着實享受這種寧靜與美麗的人卻很少。在香港，這片生存戰場上，凡中青年，一律須上場，剩下一些老弱病殘的、幼小的、點綴着這派景致。而在他們之中，唯我，是一個突出的不協調：非但年處精壯，又能有在此踱步的清閒，而且還經常一人獨語，激動時狂奔如風，臉色蒼白，目中無物，速寃一隅僻靜處作半蹲半跪狀，取出紙筆來，亂塗一通，繼而才緩緩起身，再次漫起步來。

那是一個仲春的下午，陽光明媚，氣候溫潤。我習慣地將紙筆袋入口袋裏，便神情恍然地踏上了正處於花絢葉茂之中的平台花園。通常，我不是垂頭凝視足下流過的地面，就是仰首空對碧天浮雲，其實在此思路騰躍的當口，即使目光迎視過任何人或事，也都不會有產生令其聚焦之能量的。然而，這卻是一次鮮見的例外。我竟自老遠便見到一襲少女的形象簇擁在花叢之中。她側坐着，一件薄飄的細格府綢襯衫貼合着她青春的身段。或者，她的坐姿與存在就是一首詩，反正肯定是有某種類似於意境的東西自她的周圍輻射開來，否則，我那挪動的腳步是絕不可能不由自主地向她靠近過去的。她，由一位老婦人陪伴着，坐在一張墨綠的長椅上，細嫩，白皙的臉的一側彎勾着一縷自額頭流下來

的烏髮。膝頭上攤開着一冊厚書，兩手擋在書頁上，而眼，卻是望着遠遠的海景，出神。我自她的面前走過，第一次竟沒敢轉過頭去。這是因為，要與這樣的一位矜持的少女對峙眼神，哪怕一瞬，也都需要一種心跳的勇氣。

當我在偌大的平台上繞了個圈，再次踱經她面前，但當我的目光驀地抓住了她那對大、美卻毫無動態的、雕塑物一般的眼神時，我的心剎那痙攣了：她，竟是一尊盲美！我的心砰砰地跳動，彷彿是作了什麼虧心事一般。我慌慌張張地離開，悲鬱、惆悵得幾乎有些憤慨了；其感覺與偶然撞見一樁他人的隱私，或是自己在一個光鮮的場合間作出了一項粗魯的舉止而後悔莫及時相類似。

第二天，當我重拾筆紙步上陽光之中的平台時，我，應該是懷着構思之外的另一起朦朧之目的。果然，她仍坐在原處，一樣的坐姿，一樣的打扮，所不同的是旁沒了陪她的那位老婦人。我胸有成竹地向她走去，只在長椅的邊上遲疑了一會，便在其另一端坐了下來。她似乎毫無反應，遮蓋在長睫毛之下的盲目木訥地注視遠方。和風輕拂起她略帶蓬鬆的長髮，周圍靜極了，只有幾隻麻雀在花叢間「嘰嘰」地歡叫。觀察了一會，剛打算起身離去，忽然——

「請問先生，是不是快三點了？」

我吃驚地轉過臉去：「嗯……是的。」一段靜默之後：「你怎麼知道我是一位先生呢？」

「憑直覺。」

「噢——。」我舒出一口氣來，「你很美，小姐，說真的，很美，可惜……」

她仍然堅持着那起坐姿，但我清楚地見到兩片濃濃的紅暈飛上了她桃白色的頰上。其實，這才是我想繼續表達的：「你讓所有的人都來讚慕你的美麗，卻無法體會這種讚慕的目光究竟是如何的？」當然，我嚥下了這半截話頭。

「那是十年之前的事了，一場大病後，世界從此向我關上了所有的門窗。但童年時代對於春的回憶就不會褪色，而且還隨着年齡的增長，愈來愈強烈了——我的周圍是都開滿了花嗎？」

「是的。」

「什麼花？」

「杜鵑。」

「顏色？」

「大紅：粉紅、嫩黃、雪白，繽紛極了！」

「——你能想像嗎？」

「能。她們一定都很美麗，所以我便選擇了坐在這裏。」

再一段靜默。「先生，你會寫詩嗎？」

「啊！——」這一次我幾乎是脫口而出的。

「你也喜歡詩？」

「又憑直覺，難道？」

「也不完全是，因為我自己就愛讀詩，雖然這對於我們盲人來說並不容易。呶，這便是本詩集，只不過是一種盲人讀物罷了。」這，才揭開了那本永遠攤放在她膝頭，包裹在深紫紅硬封面中的厚冊的謎底，「我愛摸讀着它，坐在春天裏，想像春天，感受春天。……不過現在，我得走了。」

• 吳正，著名作家，詩人。生於上海，現居香港。一九八四年開始發表作品。著有長篇小說《上海人》、《立交人生》、《長夜半生》，中篇小說《後窗》、《敘事曲》，詩集《吳正詩選》等。曾多次獲國內外文學獎。作品被改編成影視劇。



## 仲秋， 柏架山遇雨

□房樹德

來去，兩手空空  
只用目光留下風景  
乾濕冷暖，都不能給季節注入靈魂

雨絲與落葉，御風而行  
隱匿的童話，令人想入非非

亂唐以後，詩人被秋雨玩弄  
茅屋江水、冷食如鐵  
一大群意念，野獺般竄來竄去  
夏天的餘溫，不足以讓秋天變成情人

登高，航拍以往  
反覆調整焦距——  
原來秋天，是一次輕微撕裂

一個季節令人神情恍惚  
看不到路標，但它  
還是知道你是誰，你曾經來過

• 房樹德，報館文員，喜歡寫詩。作品散見於香港及澳門報刊。

## 致我的 父親母親

姚園

母親

請原諒我，母親  
十年了，我依然無法把今天  
視為一束烏雲過路

我無法分辨十年前  
靈車窗外那輪正悠然上升太陽的  
顏色

你紋絲不動地躺着 那靜  
那地裂天崩的靜 引來一卷悲風  
我挽起一生淚水 好讓你慈顏  
不被霹靂的雨衝散

母親，請原諒我  
十年了，我依然任刺骨的痛  
抹不去的傷  
在一個人波濤裏翻滾

我願被如此清聲掩埋  
在今天，在想你的  
每一個日夜

父親

今生 今生只能在紙上  
呼喚您了 父親

六年了 我似乎已慣於  
沉浸這樣無體私語  
慣於在每一個暗夜來臨之前  
備上一支紅燭 一根火柴  
慣於在每一次出門遠行時  
將行囊裝入一袋謹慎  
一匹自由之風  
和一縷日子裏外的  
雲淡 海闊  
慣於把您對我更多樸實教誨  
匯入每一寸光陰縫隙裏

愛您  
我的父親

• 姚園，現居西雅圖，為美國《常青藤》詩刊主編。

## 天津人在香港

方 元

同事李先生告訴我：「香港人的地理知識過不了長江。」雖然這話聽着有點誇張，但不是沒有根據。

我剛到香港工作時，一個同事問我是南方人還是北方人。我出生在天津，所以回答說「北方人」。那個同事說：「噢，你是上海人！」

在中國，南北之分一般以長江為界。上海在長江之南，怎麼算是北方？站在一旁的李先生趕緊解釋：「對於香港人，上海就是北方啦。」

李先生出生在上海，一九四八年隨父母來香港定居。在我進公司之前，他是唯

一的「北方人」。我們這兩個隔着長江的「北方人」因此而成爲好朋友。

天津籍的香港人經常會遇到這種尷尬事。上世紀九十年代我來香港的時候，大部分香港人都不知道中國有個地方叫天津。有一次我休年假，同事問我去哪兒？我說「回天津」。同事說：「噢，回鄉下。」

天津是中國第三大城市，人口多過香港。怎麼是「鄉下」？一八四一年，當香港由一個小漁村剛開埠的時候，天津作爲長江以北最大的、國際知名的商貿中心已有兩百年的歷史了。

李先生告訴我，香港人把回內地就叫

作「回鄉下」。

大概是受英國殖民地文化的影響，香港人特別愛詢問別人的出生地。每次有人問我出生地時，我都要附送他一堂中國地理課成績。

有一次在一個社交酒會上，一位嘉賓走過來與我閒談。他是一個公民教育組織的負責人，本職工作是中學副校長。他問我在什麼地方出生，我答：「天津。」

他眼珠轉了轉：「是個小地方吧？」

「是」，我微笑地點點頭。

「不怪我不知啦。它在哪裏？」

「靠近北京。」

「人口有幾多？」

「一千兩百萬。」

他眼球放大了，追問：「一千兩百萬？」

「大過香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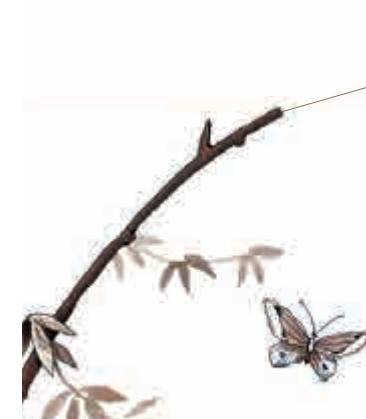
大概他認爲我講錯了數字。號稱「國際大都會」及「國際金融中心」的香港，

當時的人口「才」六百萬。在我又講了一遍數字後，他轉身去拿食物，沒再回來繼續談話。

這個對話不是發生在一八四一年，而是在香港回歸中國十年之後。作爲香港人，不應該不知道天津。在十九世紀中葉，中英兩國打了兩次「鴉片戰爭」。第一次簽訂的是《南京條約》，第二次簽訂的就是《天津條約》。

如果一個中學副校長及公民教育組織的負責人對自己國家的歷史和地理也搞不清楚，那麼我們有什麼理由去責備年輕人無知？這一次，我沒有爲自己的天津籍而尷尬，而是作爲一個香港人感到臉紅。

• 方元，香港建築師作家，著有《一別鍾情》、《一樓兩制》等建築藝術評論集。



## 護泉的人

□黃維樑

月前我寫了《楊絳就是鍾書》一文，後來演講，以他們伉儷的著作和生活爲話題，投射的照片有一張是這樣的：錢鍾書稍微低頭在看書，楊絳依偎着他，注視同一頁；兩位長者都戴着眼鏡，神情專注而愜意。我說，這照片應該是他們一生，也就是「楊絳就是鍾書」的最佳寫照。這張照片也使我想起余光中和他太太范我存。

余光中是福建泉州永春人，久居台灣高雄，今年八十八周歲。我不久前寄上生日賀卡曰：「高雄慶米壽，彩筆譽永春」。高雄有颱風大水爲患，我致電祝壽兼問候，與伉儷閒談，其間余太太說：「我近來在爲光中整理書信，包括你寫給他的。」又說：「本來九月我們要到杭州。我父親曾在浙江大學當教授，我在那裏出生、讀書，市政府要給我一個榮譽市民的銜頭。」

類似錢鍾書、楊絳一起看書的情景，在我腦海出現。余先生和太太戴着老花眼鏡，各自或一起看書報雜誌，交換心得，偶加月旦；余先生握管寫作（他不用電腦），余太太在旁邊的書桌，爲丈夫校對新書的書稿；最近則爲整理一個抽屜一個抽屜幾十年的書信……丈夫的手跡日日親炙，她偶而替他寫回信，字跡竟有幾分「余體」了。

從前家裏四千金、余老先生和范老大兩位長輩的飲食起居，爲丈夫歡迎或婉

拒訪客，種種照料種種事務，「凡」事都由「我」（范我存）負責。余先生四處演講，所到之地，余太太總是儀態優雅地陪伴着。有時余先生徇衆要求誦讀其名詩《鄉愁》，到了「我在這頭，新娘在那頭」，就在台上加強語氣地讀出「我在這頭」，然後指着台下第一排正中座位上的妻子：「新娘[就]在那頭」。這時聽衆大笑而余太太微笑，就像新娘那樣靦腆。

正因爲有范女士的「存」在，余先生才可以全心全意致力於他的永春文學大學業。與余氏伉儷爲老相識的傑出散文家張曉風，曾發表文章稱許余太太爲「護井的人」。余先生的作品如井水清甘，讀者飲之怡神。我認爲也可稱她爲「護泉的人」。八十八高齡的余老，文心與筆力都不老；創作和翻譯，仍然從這位泉州人的泉眼升噴。錢鍾書稱楊絳爲「最賢的妻」，我想余老非借「錢」不可，也要這樣形容妻子。伉儷年事高，范女士沒有到杭州領受榮銜。在高雄，如果近年是一片天藍的話，「高雄榮譽市民」的美譽，早就應歸她所有。

五四以來的名作家，妻子料理家務之外，還爲丈夫的文學事業出力，從黑髮至白頭的，似不多見。胡適的太太江冬秀識

• 黃維樑，香港著名文學評論家、學者、作家，著有《中國詩學縱橫論》、《香港文學初探》、《中國現代文學導讀》、《中西新舊的交匯》、《壯麗：余光中論》、《黃維樑散文選》等二十餘種作品集。

字不多，就算有心也欠實力。郁達夫與王映霞反目成仇，不用說。朱自清的元配相夫教子到了含辛茹苦的地步，應付家務之外，並無時間爲夫君的文事略盡微薄。梁實秋會記述與太太程季淑一起吟誦英文詩，卻沒有說太太爲他校對或整理文稿。巴金寫的《懷念蕭珊》一文，有恩愛，也有遺憾：蕭珊沒有在文化事業上用功，令巴金失望；「文革」時期知識分子成爲牛鬼蛇神，蕭珊對丈夫所寫「天雨粟、鬼夜哭」的文字，大概只能「敬鬼神而遠之」。

余太太早在戀愛階段，就爲男朋友譯抄《梵高傳》的翻譯稿，此後一直「兼任」丈夫的助理和秘書。錢鍾書盛稱楊絳爲賢妻、爲才女。范我存是賢妻；也是才女，只不過她述而不作而已。我和余氏伉儷相識數十年，余太太談文藝論時局，常見精警之論。她對玉器研究深有心得，又巧手編織中國結。最能滔滔而「述」的是藝術：賢能者多勞，她竟然可以抽出時間當義務解說員，經常在高雄的美術館爲參觀者介紹古今藝術品。

余太太快八十歲了。她近來整理書信，老花眼鏡所見，花樣年華以來兩人間的情書和家書，那一股股如泉湧出的情意，一定是回味甘香，格外珍貴。

